

上海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驻沪办事处纪念馆
编



周

公馆



中共代表团
在沪活动史料



上海周公馆

——中共代表团在沪活动史料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封面题字 陆定一
责任编辑 曹培雷
赵旭
封面装帧 傅惟本

上海周公馆

——中共代表团在沪活动史料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第七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2.25 插页6 字数290,000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208—01682—8/D·355

定价 14.00 元

DZ 44/22

编辑说明

一、本书选录的，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所藏的关于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南京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及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上海工委)在上海活动的史料。

二、本书按文献档案、报刊资料、日记、回忆录、大事记等分类，依时间顺序编排。

三、为方便读者，编者对相当部分的资料加了标题，并用“*”注明；资料标题下的日期，均为编者所加。

四、为保持资料的原貌，落款处的日期仍保留。

五 编者加语及补缺字，用方括号“[]”。书中的注释均为编者所加。

六、书中凡引自原件的资料，用“原载”标明。

七、书中的回忆录，个别内容与主题关系不大者，均作了删节。这类资料均无日期。



1946年周恩来在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留影。



马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中共代表团
驻沪办事处(周公馆)外景。



周恩来致宋子文请拨驻京、
沪办事处办公用房函。



周公馆门牌。

1946年7月，周恩来在上海与『联总』、『行总』就救济物资分配及黄河复堵问题进行谈判。



1946年7月18日，周恩来在周公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控诉国民党暗杀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的卑鄙行径。



1946年9月1日，周恩来向记者介绍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情况。





1946年10月19日，周恩来与国民党及第三方面代表在上海吴铁城公馆（今海格路464号）举行非正式会谈。图为会谈后合影。前排左起：黄炎培、周恩来、郭沫若、沈钧儒；后排左起：胡政之、陈家康、陈启天、李匀田、邵力子、罗隆基、吴铁城、李维汉、左舜生。



1946年10月19日，周恩来出席了上海文协等12个团体在辣斐大戏院（今长城电影院）举行的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大会。图为周恩来在会上发言。



周恩来、李维汉与郭沫若周公馆门前合影。



1946年10月4日，上海各界人士在天蟾舞台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图为中共代表邓颖超（中）、李维汉（左一）在追悼会上。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
两位先生，时局如此险恶，人心
如此悲愤，但此心此理，有
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
信念，向殉难者默哀。心不死，
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
杀人者终必受惩罚。

周恩来

周恩来为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书写的悼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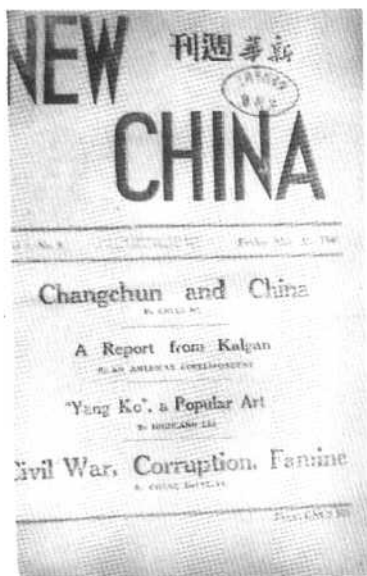
董必武与“解总”上海办事处工作人员在周公馆合影。左起：董必武、成润、赵明甫、王笑一、林仲、纪锋。



1946年6月23日，上海爆发了由上海工委及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共同领导发动的反内战和平请愿运动。图为运动场景之一。



由上海工委负责编辑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群众》周刊（沪版）。



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编辑出版的英文刊物《新华周刊》。



1947年3月5日，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最后一批撤离人员在周公馆合影。左起：鲁映、王知还、计锦洲、陈家康、王凝、吴月凤、刘昂、钱之光、黄月仙、华岗、王文忠、潘梓年、杨少林。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限令中共驻沪人员于3月5日前撤离，并派员监视中共人员驻地。图为当时有关报道。

上海新民報 一月八日 一九四七年

馬思南路門禁森嚴

警局監視中共人員

中共要求展緩撤退日期

【本報訊】馬思南路門禁森嚴，中共人員出入受到嚴格監視。據悉，中共方面已多次向有關方面提出，要求展緩撤退日期，以便完成必要之準備工作。目前，該處之戒備極為嚴密，任何可疑之舉動均會引起高度警惕。

院長辭職消息傳來

【本報訊】有關院長辭職之消息近日在政壇傳聞甚廣。據悉，該院長因健康原因及工作壓力，已正式向有關方面提出辭職申請。目前，有關方面正就此進行處理。

股市今晨紅了半堂

【本報訊】今日股市開盤後，受利好消息影響，多隻股票呈現上揚走勢。據統計，今日共有數十隻股票紅盤，成交量亦較為活躍。市場氣氛相對樂觀。

標賣布疋舞弊案 地院今下午再審

【本報訊】有關標賣布疋舞弊案之審理，將於今日下午在地方法院繼續進行。據悉，該案涉及金額較大，社會關注度較高。審理過程將公開透明，以正視風。

何時徵兵 夏末秋初

【本報訊】有關徵兵時間之問題，政府方面表示，將根據實際需要，在夏末秋初期間進行徵兵工作。此舉旨在加強國防力量，維護國家安全。

虎之東漸 爪小輩一

序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收集了许多资料，编辑出版了《上海周公馆》一书。该书如实反映了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初这段时间内，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内设上海工委）在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南京局的领导下的工作情况。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我愿为之作序。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彻底胜利。胜利后的中国人民渴望有一个和平建设的环境去医治战争的创伤，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心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妄图消灭中共领导的革命军队，继续实行其独裁统治。但是，碍于国内外强烈的和平呼声及军力准备不足，他们在积极准备发动内战的同时，向中共表示愿进行和平谈判，以欺骗人民，争取内战准备时间。一九四五年八月份，蒋介石先后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家大计”。

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民主和捍卫人民利益，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政府进行和平建国的谈判。由于中共在谈判中采取了“针锋相对”

的斗争方式，又作了重大的让步，加之解放区军民在自卫反击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国共双方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这个会谈纪要中，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十月十一日，毛泽东返回延安，由周恩来、王若飞留渝继续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经过谈判斗争，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又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日召开了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五方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五项协议：改组政府，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宪法草案问题。但国民党的目的是欺骗全国人民，根本无意去履行这些诺言。《停战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便向国民党各战区下达了作战令，并首先在东北挑起了内战；一九四六年春，又重兵围困我中原解放区。

一九四六年初，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由重庆移至南京。为便于在南京、上海开展工作，周恩来一方面分别致函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及秘书长蒋梦麟，提出“抗战胜利，政府还都在即，兹为与各方联系及时协商起见，敝团亟应在京、沪两地筹设办事处”，要求在南京拨房屋两幢，在上海拨房屋一幢。另一方面，又先后几次派人前往京、沪自行物色办事处用房。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中共代表团在周恩来同志率领下，由重庆迁至南京，在梅园新村设立了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内部成立了中共中央南京局。国民党为阻挠中共代表团在上海活动，没有拨给房屋，也不同意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公开挂牌。中共代表团没有被国民党设置的障碍难倒，于六月二十二日在自己租来的马思南路一〇七号设立了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对外称作周恩来将军寓所，简称“周公馆”），同时在那里成立了以华岗为书记的上海工委，统一领导公开的统战工作和部分秘密工作，出版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群众》周刊。

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设立之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

战协定，践踏政协决议，在全国各地挑动内战之际。此时的国共谈判，正如周恩来同志在《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一文中所说：“这个阶段的谈判是表面谈判，实际大打，一方面是我们坚持政协路线，另一方面是蒋不断地破坏它。”因此，这时期的谈判，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谈判已经成了“教育人民的工作”。上海办事处设立的目的就是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提供一个合法的活动阵地，以揭露国民党政府假和谈真内战的本质，宣传我党和平建国主张，团结教育广大中间人士，壮大爱国民主力量。

上海办事处设立后，中共代表团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等同志经常往返于京、沪之间，他们利用南京谈判的间隙，前往上海，在周公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向国内外新闻界介绍中国内战局势与和平谈判的进展动态，阐明我党关于和平建国的各项主张，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面目，抨击美国政府转让战争剩余物资，援助国民党打内战的错误政策。同时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寓居上海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我党各项方针政策，与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消除了一部分中间人士对我党的种种疑虑和对国民党政府所存的幻想；还举行各界人士的座谈会，向他们介绍南京谈判的情况和国内形势，鼓励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团结教育了广大民主人士和朋友，壮大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上海工委在南京局的领导下，也积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九月，国民党军队在和谈烟幕的掩护下，向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队攻占我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后，蒋介石即下令召开“国民大会”。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共的坚决反对，悍然召开了没有中共及民主同盟代表参加，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从而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十一月六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了最后一次

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声明》，指出：国民党已经把政协决议破坏殆尽，和谈之门已被最后关闭，宣布结束一年多的和平谈判。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返回延安，中共代表董必武和部分工作人员则仍继续留在南京、上海工作。

周恩来等返回延安后，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改为联络处，继续开展各种活动，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非赶不走”的方针。由于国民党加强了对中共代表团的限制和监视，使我党工作遇到了许多困难，华岗和大部分工作人员，分别转移到香港或回到解放区。一九四六年底，董必武，钱之光同志先后来上海联络处主持工作，领导办事处工作人员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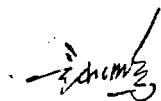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国民党反动当局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先在重庆、南京派特务、宪警包围了设在当地的中共联络处，限令那里的工作人员于三月五日前撤离。二月二十八日晚，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也致函中共上海联络处，胡说什么“查贵党拒绝和平谈判，制造内乱，复在本市煽动风潮”，限令中共驻沪人员于三月五日前全部撤离。同时派警察、特务包围监禁了周公馆，限制了联络处工作人员的活动自由。三月一日，董必武致函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和上海警察局局长俞叔平，向他们提出了严正抗议。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及《新华日报》上海办事处，《群众》杂志社工作人员一行三十三人在国民党警察、特务的监视下，被迫离开上海，乘火车前往南京。在董必武同志率领下，三月七日与中共代表团驻南京工作人员一起胜利返回了延安，从而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

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上海工委）从设立到撤离，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九个月，但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领导下，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宣传、统一战线等工作，同国民

党内战独裁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我党赢得了民心，壮大了爱国民主力量，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时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武汉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在重庆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解放战争时期又在南京成立了中共中央南京局，这几个中央局的党史资料书都已先后出版，《上海周公馆》这本书的出版，可作为《中共中央南京局》的补充。此书的出版不仅是对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很好纪念，同时也为在新形势下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为加强党建及党史研究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一九九二年三月